

收稿日期:2021-05-21

## 《三鱼堂日记》的话语言说方式与陆陇其的儒学世界

田明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5)

**摘要:**《三鱼堂日记》带有浓厚的语录体色彩,“嘉言”辑录是其主要话语言说方式。这种方式既凸显了作者理学家的身份,也昭示了清初儒学日常化的内在演变,并可从中看到作者追求社会秩序稳定等内在心态。陆陇其的朱子学信仰和对知识的强烈兴趣,使《三鱼堂日记》的内省及自我表达的话语系统呈现知识化的特点。在朱子学的智识主义传统与清初实学思潮及经世观念的影响下,《三鱼堂日记》彰显了陆陇其力图合学问与经济为一体,并以此构建一套完整儒学世界的追求,由此也可以窥见清初士人学术兴趣所在、知识系统来源与知识边界的变化。

**关键词:**陆陇其;《三鱼堂日记》;言说方式;理学

**中图分类号:**I2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4-0078-10

**作者简介:**田明(1994—),男,江苏扬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诗文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4.054

被清廷推许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sup>[1]</sup>的陆陇其(1630—1692),原名龙其,因避讳改名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陆陇其从顺治十四年(1657)秋一直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去世为止,时断时续,共留下十多卷日记。他去世后,这些日记一开始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直到晚清才陆续出现刻本。曾有人将这些日记题作《陆清献公日记》,现根据光绪十六年(1890)许仁杰所刻《陆子全书》中的题名,统一将其称为《三鱼堂日记》。

《三鱼堂日记》内容驳杂,包罗甚广,正如道光年间张履所总结的:“是记所录,凡舟车之所历,耳目之所构,日星之运,江河之流,时政之得失,民生之利病,罔不留意。”<sup>[2]</sup>《三鱼堂日记》详细记录了清初社会中河槽运输、时局世态、朝廷政策、官场吏治、文士交游等多个侧面,单纯作为研究清初历史的一种史料文献,其重要价值已无须多言;如果将之当作一种文学文本来看待,那么或可以通过另一视角,看到以作者为代表的清初士人精神世界的某些内在景观。清初理学家普遍重视将“内圣”与“外王”两方面统合在一起,将自我融合在一个完整的儒学世界中,从而消弭持续作用于内心的紧张感。这也正是陆陇其所努力臻至的境界。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他对这种内、外双重层面的儒家世界进行全面构建的追求,以及这一过程中内在心态和知识兴趣的变化,那么今人对他的评价,只能长期继续停留在被各种权力话语塑造而成的“理学名臣”的刻板形象层面,正

如百年前梁启超所感慨的,这“不独清代学界之不幸,也算稗书之不幸”<sup>[8]</sup>。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形式,往往是思想世界运动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其言说方式正反映出作者某些内在的心理状态,在宏大、整齐、成体系的论著之外,作家更为零碎、细微的心灵动态,需要从日记这样的文学文本中发掘。因此,我们尝试从日记文本的话语言说方式的角度去分析、感知作者的独特内心世界,并进一步去理解一位17世纪士人的学术兴趣与知识边界,以及这些知识对他构建儒学世界的意义。

### 一、“嘉言”辑录:以“言”为中心的文体形式

在清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初二这一天,陆陇其记录下了自己撰作《三鱼堂日记》的初衷:

上年(顺治十四年)始为日记,欲以记师友之嘉言,考一身之勤奋也。后以考事逼迫而暂止,因循一载,缺焉不书。今思复理前绪,断自庄简之言。然一载以来闻见言行,有不可忘者,略记如左。<sup>[2]4</sup>

这一年陆陇其29岁,正在嘉善李氏家坐馆,同时从事《四书大全》的编辑工作<sup>[1]18</sup>。“记师友之嘉言,考一身之勤奋”,显然是他撰写日记的最初目的。尽管从后来《三鱼堂日记》的实际写作情况来看,其中不少内容已经远远超出这一范围,但“记言”依然一直是其中的主要话语言说方式。这体现在《三鱼堂日记》所采取的叙述模板基本是固定的,即以某人“言”“语”“曰”“云”等形式展开。例如在七天后的九月初九,他和友人一起到景德寺大悲阁登高游览,看到了前明阁臣钱士升(1574—1652)的遗像。回去后,友人向他提起了钱士升的轶事和名言:“塞庵之始第也,寓书于其家曰:‘吾赖祖宗积德而至此,自今吾家但益务德,勿以贵生事,致损后福。’一时皆传诵钱状元家信云。”陆陇其认为钱士升的这番话是值得记录的“嘉言”,便抄写在了当天的日记中,并在其后附评论道:“塞庵以韦布握相印,至今门第未绝也,其在斯言乎?塞庵既贵,子弟仆从恣睢生事者不能尽禁,犹不能无憾于斯言也,而况推而行之,诚以居之,务极斯言之旨乎?”<sup>[2]5</sup>显然,他不仅认真记录下了这条“嘉言”,还对其具体实践过程进行了思考,感慨后世之人践行“嘉言之难。

诸如此类的记录形式在《三鱼堂日记》中明显占据着中心地位,“嘉言”的汇集自然也就成为《三鱼堂日记》的主要言说方式。这些“嘉言”多半是儒家思想在修持己身、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一般性原则,像恭敬祖先、克勤克俭、谨言慎行等,内容多极为朴实,体现了一种儒学日常化的取向。不过,在儒家对生活的一般性指导原则之外,间或也会出现一些处世办事的实际经验,比如顺治己酉年(1658)所记录的“随笔”,大多是这种家族长辈所传授的处世方法。像“凡人有事而我欲助之,当置身事外,不可身入事中”“凡事不可轻随人”“成大事者必咨众力,故小事不可轻动众,当养之以大用也”<sup>[2]37</sup>等语,都类似晚明一度非常流行的劝世文,在陆陇其的思想世界中,这显然同样属于“嘉言”。可见陆陇其并非单纯的道德至上主义者,其“笃行践履”的背后,同样有着非常灵活的实际办事手段与态度。

作为一种相对自由、私密的文体,日记文体的形式本应该是灵活多样的,就像明人贺复徵所言:“日记者,逐日所书,随意命笔,正以琐屑毕备为妙。”<sup>[4]645</sup>但《三鱼堂日记》的写作明显不是“随意命笔”的。各种“嘉言”的汇集与记录,使得其内在形成了一套很规整的文体言说体系,即“记言”体。与晚明日记常见的轻澹俊美、潇洒随意相比,《三鱼堂日记》更为严谨整饬、富有条理。这种以记言为中心的文体形式,使得《三鱼堂日记》看上去更像是语录体散文。“语录”体在我国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以《论语》《老子》为代表的诸子著作。唐宋时期禅宗、道教说教布道,又特喜撰作语录,并留下了如《五灯会元》《玄珠录》等富于文学色彩的语录作品。宋明以降,随着理

学发展及民间讲学运动的兴起,这种浅白简约的文体形式因有助于学术思想的传布,颇受当时士人喜爱。宋明理学语录中如《朱子语类》《白沙语要》《传习录》等,既是丰富深刻的思想文献,也是意趣灵动的文学文本。而晚明一度流行的如《舌华录》《娑罗馆清言》《呻吟语》《菜根谭》等清言小品,同样可以看作是语录体的另一种衍生形式。陆陇其在日记中采用这样的行文方式,一方面体现了时代对他影响的痕迹,一方面也正展示出他对这种简捷直观的述学方式的认可。语录的形式更方便儒学思想的传布和进入日常生活,符合他对学术重在笃行践履的预期,也合乎他作为理学家的身分。同乡柯崇朴在为他撰写的《行状》中曾提到:“其篋中所遗,有《问学录》一编、《日钞》二十卷,尚有语录若干,文集若干,方在汇辑,俱未授梓。”<sup>[5]</sup>把日钞、语录等手稿放置在一起,则其平时抄录、撰写语录的习惯可见一斑。

这种“嘉言”汇编的文体形式,使得陆陇其往往会借助抄录他人语录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从他对这些语录的选择、去取乃至评点中,我们可以观察其儒学世界中的某些侧面。尽管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因“嘉言”所产生的具体语境不同而产生若干种变异,但这些变异的文体形式同样流露出他对事物的判断和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陆陇其看待事物的某些特殊心态。如康熙癸亥年(1683)九月十一,他照例记录下与友人的一段谈话:“与徐胜力谈及吴昌时,胜力极言其气谊能引翼人,而为其引翼者,乃反噬而詈骂之,岂足以服人哉?呜呼,反噬者不必言矣,昌时之引翼人,可谓真气谊乎?此其好处,亦不过游侠一局耳。太史公《游侠传》真害人不浅,岂特昌时哉。今之效其所为者,盖亦有之矣。”<sup>[2]203</sup>对太史公为游侠作传的批评,反映了他对游离于社会固有秩序之外行为的反感。陆陇其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廷定鼎中原未久,天下人心未稳之时,抗清斗争尚未休歇,明清易代的战火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如陆陇其这样的士人,对社会安定的期盼无疑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对秩序稳定的渴望,导致他对清廷的统治由衷拥护。比如康熙乙卯年(1675)三月初八寓居京师时,他与友人谈论康熙皇帝的言行,晚上在《三鱼堂日记》中就记录白天的言谈道:“朝廷勤学,前古所无。坐处环列皆书籍,尤好性理、五经、四书。”“于酒色俱无所好,惟好猎。自滇、黔兵兴以来,深以好猎为非,益笃志于学。”“性最宽大,最聪明。所望圣德更进,振朝纲以及天下者,则惟在勇断耳。”<sup>[2]159</sup>充分表达了对康熙皇帝的好感。明遗民所坚守的夷夏之防及由此带来的紧张感,在他这里已经消弭于无形。再加上他坚守朱子学立场,正完美地符合了清廷建构意识形态的需要,因此在雍正年间获得了从祀孔庙的殊荣,乾隆元年被谥为“清献”,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sup>[6]</sup>,完全被塑造成为一种政治符号。这与同样坚持朱子学立场,但是以遗民身份自矜的同乡好友吕留良(1629—1683)相比,身后待遇相去何啻霄壤。

此外,这些“嘉言”文体还包括若干方面的变异。在范围上,“师友”之外,凡在阅读中见到的“嘉言”,陆陇其也会一并抄录在日记中。例如他在康熙戊午年(1678)三月十六记录道:

十六。往常熟,舟中阅《素庵野抄》。此书系吴人蔡士顺(字孝来)辑,专记天启时事。见方震孺孩未论挺击东林事曰:“善处人骨肉之间者,原不可无调停之法。然不当因己之调停,而遂疑挺击之奸化为乌有也,又不当谓发奸者尽小人,而遂扫荡,不留种也。东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奸险贪横,实繁有徒;尔时不肯依附者,自是刚肠男子。然不当因不肖者,而遂为竭泽之渔也。又不当因亲以及亲,因友以及友,而更为瓜蔓之抱也。”此论最公平。<sup>[2]88</sup>

晚明党争中,东林党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一直备受争议,褒之者誉为君子清流,贬之者斥为亡国祸首,陆陇其有意选择方震孺的议论记录,说明评价东林党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由此可见陆陇其的政治立场与诸多江南文士不同,并不一味偏袒东林。

其次是在这种记言式的叙述方式中,如果把“言”所产生的具体语境交代清楚,则原本的“嘉

言”体很容易演变成文言笔记小说。例如康熙乙卯年(1675)为记录清初名吏于成龙的“嘉言”,将当时的情形也描写得详细生动,颇似小说家言,人物形象在此几已呼之欲出:

武昌知府于成龙向为同知,行保甲之法最善。其人居湊密之处,必亲自查验,简輿从步行,不扰民。其法十家可知。然亦不遽罪也,呼其人论之曰:“汝自今以往要学好,它日地方有事,我必罪及于汝。”往往多远去者,境内以清。尝出,见负贩者买肉四五斤,问之曰:“汝安用许多肉?家有祭祀乎?”曰:“有客耳。”曰:“汝不节如此,必至匮乏;匮乏必借贷;借贷多,则不能清;不能清,则莫肯借;莫肯借,则凶年无以为生;无以为生,则不能不为小盗,以渐至于大盗。此何可长也。”责之五板而去。<sup>[2]68</sup>

这种几乎类似于小说的文体形式,使得作者在生动的叙述中,悄然传达了自己对“节用”观念的赞赏。

最后是其所记之“言”本身也未必完全是道德意义上的“嘉”言,也可能仅仅是友人间的日常对话交谈。他的“师友”不少都是一时名流,出现在《三鱼堂日记》中的清初政界、学界重要人物,据笔者简单统计,就包括魏象枢、仇兆鳌、朱彝尊、叶方蔼、曹溶、徐乾学、李光地、汤斌、张烈、万斯同、施闰章、李因笃、阎若璩等,堪称是勾连起整个“京师-江南”地域的文化交际圈。这些“师友”在日常交谈中,常有对前朝及当世人物的品题,涉及许多时事和名人轶事,这些言谈自然也就被写进了日记。比如有关钱谦益的记录,仅在《三鱼堂日记》第三卷康熙乙卯年(1675)就有两条。三月初七条云:“初七,候赵年兄(名廷珪),因谈及毛子晋家书籍,其后人不能守,皆卖于季沧葦;钱牧斋以其子孝廉今河南永城知县上安不能守,尽以其书予族人钱曾,曾亦卖于季沧葦。又云:牧斋《初学集》之外,又有《有学集》。其晚年之文,大抵皆留心佛典。”<sup>[2]56</sup>五月初四条云:“赵禹玉言:常熟先辈瞿稼轩,系钱牧斋之门人,其晚节最善。然其居乡,暴横贪淫不可言,与钱相结为党。钱在弘光时所以不得志者,则以阮大铖;在本朝所以不得志者,则以冯铨。”<sup>[2]67</sup>这些围绕钱谦益的言谈议论,说明牧斋轶事已经成为当时京城文化圈的公共话题。作者对此同样津津乐道,娓娓道来,颇有趣味,正反映陆陇其本人入世极深,且乐于交际,交游广阔,与一些纯粹持重修身、疏离世事的理学家迥异,陆陇其的个人性格特点在这里展现得较为充分。同时他的这些记录,也为我们认识清初士人的侧面提供了更为丰满鲜活的材料。

## 二、“经世”系统话语下的知识、经验与技术

《三鱼堂日记》的知识系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朱子学及传统经史之学所构成的“内圣”系统,一类是以“经世”为导向,处理具体事务所必需的知识、经验与技术,即“外王”系统。第一类在《三鱼堂日记》中往往以自我表达的方式出现,第二类则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和经世致用学风的盛行有关。明清之际的士人爱谈实学,强调读“有用”之书,写文章也好写“经世”之文,正体现了一种经世致用的思想趋向。这种“经世”思潮,本身带有非常复杂的性质,它既是中国传统学术精神中积极关注现实社会的体现,又是士人参与现实政治要求的反映。曾有学者指出,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是与道德伦理、性命探求以及经济事功密切融合在一起的<sup>[7]</sup>。“经世”话语内涵在明末清初的变迁,本身也暗藏着从干预现实政治向具体的治理知识与手段转化的思想路线迁移。如果说晚明大量出现的“经世”言论以及著述,反映的是士人对现实秩序失控的焦虑,那么清初同样流行一时的“经世”话语,则更多是士人群体在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战火后,对一套完整而具体的知识、经验与技术的需求,以及借此尽快恢复社会秩序的愿望。

陆陇其曾在康熙十四年(1675)任江南嘉定知县,康熙二十二年(1683)任河北灵寿知县,康熙二十九年(1690)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在清廷官僚政治系统中多次扮演过地方行政官员的角色,这

些经历使得他对具体行政所需要的知识分外关切。比如他多次从家乡浙江平湖前往京师,常会在日记中详细记录水路里程数据,并对所经过路段的地理渊源、沿革做详细考述。在《三鱼堂日记》卷一顺治丁未年《南旋记》末,就附有《附漕河至北京路程》《附漕河路程》《附边海郡邑卫所》《附沿江郡邑》五份河道里程数据,同时记录了河流走势与地理沿革,这些记录甚至对今天的河流水利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考虑到清人日记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如此详细的数据记录,当可被视为当时的一种公共知识文本。《三鱼堂日记》中的这类文本还包括卷二丁未《南游记》、庚戌《公车记》、壬子《淮游记》等,作者在其中不厌其烦地描绘沿途山川地形、河流走势、地理沿革、人文风貌,同时还表现出浓厚的考据热情。如在康熙丁未年(1667)《南游记》中,他路过邻县庆元,记载庆元县的名称沿革道:“庆元县五季时为松源镇,王审之据闽,夺而有之。迨宋,属处州龙泉。至宁宗庆元三年,礼部尚书胡纘请于朝,以所居松源乡为县,遂以年号纪名,故曰庆元。”<sup>[2]34</sup>还分析当地风土民情道:“县山多田少,地僻民稀,舟楫不通,市无奇货。民惟重本薄末,农圃之外,无余事也。故上户贮蓄以为富,中户力田以自给,下户佃耕,食其余羨而已。是以富不至巨万,贫不乏食,亦乐土也。”<sup>[2]34</sup>这样的言说方式,正表现出他对农业社会所必需的农业、水利、舆地等知识的浓厚兴趣。

天文、历法、术数、星象等传统技术性知识,也同样属于陆陇其所关切的“经世”知识谱系,这种关切使得他对当时西洋天文历算知识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三鱼堂日记》中多次提到他与西洋学者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交往,以及前往开设在北京的天主教堂,参观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天文仪器,购买阅读西洋历法文献的经历。比如康熙乙卯三月廿三日记云:“同屠尹和至天主堂观浑天球。其制如鸡卵,浑天球半在其上,半在其下。盖地本在天中,今却在天外;星本在天下,今却在天上,以人从外视之也。盖古之所谓浑天象者如此,若浑天仪,则又不如此。”<sup>[1]59</sup>这其实是西洋科学对地球外观的描绘,与中国古代习见的“盖天说”完全不同。不过这种宇宙观对陆陇其内心的冲击似乎并不算明显,因为他很快就从古代学说中寻找到了相应资源,显得颇为悠游不迫。从陆陇其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清初士人们在中西学术交汇碰撞下的一些真实心态。

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与制度的思考在《三鱼堂日记》中亦不乏其例。面对晚明以来迅速发展的工商业,陆陇其表现出相当开放、包容的态度。康熙戊午年(1678)七月初五条记云:“偶读杜诗‘眼前无俗物,多病亦身轻’,窃思农工商贾是其本业,不可谓之俗物。有身列士林而心竞锥刀,言之津津有味者,其真俗物也软。”<sup>[2]116</sup>将农工商贾并提,不以为俗,可见陆陇其并非不通事务、顽固守旧之辈,相反,他对社会变化有着较为敏锐的察觉和感受。在平时的经典阅读中,也常常能延伸出对当时制度的思考,比如同年四月十三日条记云:“阅三代兵制,思今日八旗之制,颇有兵农合一之意,但古者以比闾族党州乡而易其伍两卒旅师军之名,今则以伍两卒旅师军而易其闾族党州乡之名,此不能无异。”<sup>[2]105</sup>这样的思考往往针对当时的现实而发。当这些思考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成为具体的官僚行政经验。

陆陇其对具体行政经验是极度重视的,《三鱼堂日记》的许多“嘉言”记录,很大一部分正是与此有关。比如针对晚明以来出现的“胥吏”干预行政问题,陆陇其在日记中就多次提到。康熙乙卯年(1675)四月初二条记云:“候陈夫子……言做官不可轻易出牌,如一事有原牌,有催牌,又有催催牌。原牌有号,而催牌未必有号。迨注销之日,原牌销而催牌未必销,奸胥便因之有恐吓乡民之患。”<sup>[2]61</sup>同年四月十五日条记云:“程禹门言:松民有大惑不解之积弊,不肯完正额之粮,而馈遗胥吏,以为迟缓之局。莅斯土者须编处晓谕,先去此弊,然后可为也。”<sup>[2]64</sup>此类记载在《三鱼堂日记》中有很多,可见陆陇其对此问题的关切程度。

再康熙庚戌年(1670)五月十三日,他前往嘉定县准备上任,路过常州,准备拜访友人赵慎旃。赵慎旃暂时未归,他便与赵父夜饮,当日的日记中就详细记录了赵父的不少劝诫<sup>[2]46-48</sup>。其中除

了“做官如做文,要反覆思维”等“嘉言”而外,还有关于如何防备“胥吏”狡猾手段的经验。如:“士人初入官,不能知钱谷之数,势不得不需人。彼习知钱谷者,未必能守道义。中途胥吏便与关说,及至任,虽至差谬,不肯举摘。若过于防闲,又非‘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之道。此处最难,故平时算法,亦不可不学。算法苟熟,则人庶不敢欺。”赵慎旃的父亲曾在公安县任职,也曾是官僚阶层的一员,在这次夜饮中,向他传授了不少为官的具体经验,像如何防止逃民现象:“征粮设立图差,此大弊之道。图差必揽细户之粮,恣其侵食,而不完纳。临比支吾,积久,便指为逃户,官府无从辨其逃与不逃也。然业户可逃,而佃户不可逃。吾在公安时,凡称‘业户逃绝’者,唤佃户至堂上,责其完纳,即其所佃之田,官为立文契以与之。无几时,业户皆自出,愿输粮赎契,县遂无逃户。”如何处理诉讼案件:“在公安,凡受词讼,必召而劝之,告之以官府之不能尽明、胥吏之不能不索诈。与其受辱于官吏,何如息一朝之忿为愈?必不可已,然后听之。往往有怀词而去者。”此外种种,不一一列举。这些经验描述,既展现了清初基层公共管理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些“经世”经验在陆陇其的儒学世界中所占的分量。其实这些经验未必完全符合儒家道德准则,例如“昔之积阴德者,只在爱百姓;今之积阴德者,尤在爱绅衿”,与儒家所积极倡导的民本理念颇有不同,这体现了基层官僚在处理实际事务时的灵活手段。陆陇其大大方方地将这些经验记录在日记中,不做掩饰,足可以见到其内在儒学世界中灵活变通的一面。

农业社会的官僚,必须依靠一套具体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体系,来帮助完成行政工作。这种知识系统与儒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经史考据、理学思辨乃至道德践履的层次之外,一个拥有完整儒学修养的士人,还需要这些具体知识的辅助,以便完成事功经济层面的“外王”事业,二者可以说是紧紧缠绕,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二者整合在一起,才能帮助士人完成儒学世界重构的任务。但这种联系似乎常为人们所忽略。比如长期以来,人们以“笃行践履”评价陆陇其的儒学,这个“笃行”,似乎仅仅停留在道德实践方面。例如陈来先生就曾如是评价:“陆陇其强调实行实学,反对空谈心性,反对太极玄想,要求使学问向人的道德实践方面发展,反对空谈心性,表现出他与早期朱学的差别,可以说他是属于清初理学内部的实践派。”<sup>[8]</sup>这里未曾提起的,是在道德实践之外,陆陇其还在努力追求掌握一套完整的“经世”知识系统,这正是他构建完整的儒学世界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

这套“经世”知识的来源,在《三鱼堂日记》中也能瞥见一斑。除了师友传授、亲身考察以外,他的知识来源也多基于书籍文献。《三鱼堂日记》多次记录自己购买并阅读历法、舆图、邸报等内容,如康熙乙卯年五月廿五:“至报国寺,买《日躔表》二本,乃西洋历书中之一也。”<sup>[2]70</sup>康熙戊午年七月初八:“看报,见太常卿朱裴请行朝议之法。”<sup>[2]116</sup>康熙戊午年八月廿七:“义山以靳总河《疏略》来示。”<sup>[2]124</sup>丰富的“经世”知识来源,正反映了清初士大夫的学问趣味和知识边界的复杂。在陆陇其的儒学世界里,只有信仰与知识系统进行充分整合,才能达到内在的完满自足,满足一个儒家士人对自我身份的期许。正如他在康熙戊午年十月十四日条所记下的:“阅张篔山《与熊青岳书》,论学问、经济虽不是两个,毕竟经济有从学问来者,亦有不从学问来者。从学问来者,学颜子之学,即志伊尹之志;不从学问来者,则为骄吝,为器小,为执拗,甚至为奸险。非不自谓有猷有为,而其实毒苍生而误国事者,即此自命为经济之人。其论最快,正是今日用人对病之药。”<sup>[2]159</sup>“学问”与“经济”的合一,正是他一生都在努力实践的目标。

### 三、陆陇其朱子学信仰的内化与自我表达

《三鱼堂日记》还存在一套以“考一身之勤恳”为目的的内省话语系统,这种内省其实也属于记言的形式,只不过展现的是作者的自我言说与表达。陆陇其惯于将自己日常所思的感触、心得记录在日记中,体现了其于日常人事上所做的切实自省工夫。例如在顺治戊戌年(1658)三月二

十五日,陆陇其自当湖至武塘,途中有感而发:“士君子出言,当一言当百,不可多言取厌,虚言取薄,轻言取悔。”又曰:“士君子临事,当于难处求其易,易处思其难。”<sup>[2]5</sup>

这种思虑与自悟在陆陇其是可以随时随地产生的。日记里充满着“因思”“偶思”的字样,且这一过程常伴随着经典的阅读与反刍。例如在康熙戊午年(1678)进京考试的路上,三月廿三日记云:“偶思‘不贰过’之境界,其难处有二:一则因循怠忽牵制,过将复生;一则虽有心改过,而见识未到,如因噎废食,矫枉过正,亦是贰过。”<sup>[2]90</sup>四月初八日记:“又六十里,至峒嶋集。因思平日于孔子‘得之不得有命’一句,颇有得力处。自今思之,朱子‘命不足道’一句,尤不可不时时佩服。”<sup>[2]108</sup>有时即便在梦中,也一样会对经典进行涵咏体味。康熙己巳年(1689)十一月二十日记云:“梦中体认《孟子》‘无伤也,是乃仁术也’一节。此当与‘钩而不网,弋不射宿’‘不杀胎,不殀夭’同看。爱物之仁,只应如此,此其所以为‘无伤’也。觉津津有味。”<sup>[2]266</sup>这些对经典文本的反刍涵咏与心得体会,构成了《三鱼堂日记》的又一主要话语言说形式。

事实上理学家重视以日记的形式省身克己,慎于修身,自晚明以来即已成为一种时尚。王汎森先生曾对明末清初修身日记进行过研究,认为晚明以来出现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导致不少“功过格”“日谱”一类修身日记的产生。王汎森指出:“宋明理学修身日记的传统,明季功过格运动对儒家士大夫的刺激,理学思想由重悟到重修,及主张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达到超越的思想,还有士人对晚明风俗习染的不满,都是激起这一波修身日记运动的重要原因。”<sup>[9]</sup>陆陇其日记中的自省话语系统与明末清初的这种一时风尚自然不无关联,但他与一般修身日记有所区别的地方,则在于其对朱子学的尊崇几乎已经到了信仰层面,并内化为一种内在的思维习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清初朱子学的复兴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史现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清初朱子学的复兴,既是对晚明王学末流空疏误国历史的反思结果,也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广泛影响的产物。”<sup>[10]</sup>王学空疏、实学思潮兴起,以及对稳定秩序的期盼等因素,都可以认为是陆陇其从早年的王学立场转向朱子学的原因。当朱子学成为他内在信仰世界的一部分时,就会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塑造他的内在性格,以至于他在驳斥别家学说时,使用的口气坚定不移,自信丰沛。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陆陇其对阳明学的批驳显得较为系统<sup>①</sup>。在日记中,这种“门户之见”就显露得相对自然直接,有时还带有情绪化的成分。比如他屡次提到浙东阳明后学刘宗周、黄宗羲等人,口气都不甚尊崇。他与黄宗羲虽为浙江同乡,但几乎没有交往,日记里也多次反映出对黄宗羲的偏见。康熙辛酉年(1681)五月初一条云:“仇沧柱以黄太冲《学案》首六卷见赠。其书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谓有功。而议论不无偏僻,盖执蕺山一家之言,而断诸儒之同异,自然如此。愚因思经师与人师不同,而人师内又有二种,有兴起之师,有成德之师。若蕺山先生者,以为兴起之师则可,以为成德之师则不可。而太冲尊之太过,所以多费周旋。”<sup>[2]180</sup>康熙癸亥年(1683)八月廿二条云:“会张夫子,言今浙东学者多主阳明,争意气乎?抑确有所见乎?意大不满于梨洲之学。”<sup>[2]202</sup>康熙丁卯年二月初三条云:“三儿夫妇回,带《孙徵君年谱》来。阅之,叹近年来南方有一黄梨洲,北方有一孙钟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学者多被他教得不清不楚。”<sup>[2]241</sup>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有时并无论证的过程,只是挟有情感上的不满,这也正是日记文体所以区别于别集论说文的特点。以至于钱穆曾说:“余读孙、黄、陆三书,语言涵义最不清楚者乃是稼书。”<sup>[11]196</sup>“不清楚”处多指这种日记体而言。又陆陇其老年时尤其乐于以尊长的身份向后学辨析学术异同,如康熙癸亥年(1683)正月十七条云:“嘉定钱子辰来。其向学之志甚诚,但观其所自叙,则知其初未见予之前,则专信象

① 如其撰作《学术辨》上、中、下三篇,从各个角度批判了王学的弊端,并将明朝覆亡归咎于王学泛滥,言辞逻辑清晰完整。见陆陇其撰,王群栗点校《陆陇其集·学术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

山、阳明,既见予之后,则并信考亭。近又见得朱、陆各有是非,惟从朱、陆之是,不从朱、陆之非,所据惟一理。……其所见甚怪僻,余一一为辨明,未知其迁改否也。”<sup>[2]192</sup>这种口吻显然是非常自信的。

信仰要比思考来得更为简捷直接,不同于理学思辨的深邃高明,信仰更多的是一种内化作用,在日记或其他论著中表现出的话语特点也多是简洁明了。他曾在康熙戊午年(1678)十月三十日条自言道:“辨学术异同,若在经书文义上辨之,则彼此胶执,葛藤无已矣。且舍文义,而单论下手工夫,则得失自见。”<sup>[2]167</sup>“单论下手工夫”,正反映出内在思维的简省,而更偏重笃行践履。钱穆曾讥其未知朱子学的精义,理学思辨素养远逊于同时代诸子,认为他的议论“空洞无物”,只是“理学中一乡愿,而依傍门户以自高”<sup>[11]201</sup>,只是如果考虑到陆陇其的思想特点就是这种简省直捷式的,则钱穆持论就不免过苛。

此外钱穆还认为,“稼书于朱学,仅为一种四书之学而止”<sup>[11]180</sup>,批评他“浅衷狭识”,“终无与于卫道之大任也”<sup>[11]188</sup>。但从《三鱼堂日记》的记录来看,陆陇其的学术趣味非常丰富,其知识边界远非四书学所能囊括,更不能简单地认为他“狭识”。朱子学本身即有浓厚的知识主义倾向。朱熹对“格物致知”的强调是不厌其烦的:“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sup>[12]</sup>朱子正是希望学者通过“闻见之知”的博览开启心智,从而达到完美的道德境界,这种“道问学”的倾向与象山“尊德性”的内倾路向有着明显差异。陆陇其终身保持着对知识的热情,即便是最琐屑细致的知识,也会不厌其烦地记录在日记中。例如康熙乙卯年(1675)四月十六日记云:“子振来,言北人读‘陆’与‘庐’皆若‘路’,满人言‘哈番’者,犹汉人言‘官’也。”<sup>[2]65</sup>这种对读音差异的辨析在日记中俯拾即是,作者对此不惮其烦,一一记录,由此可见其对“闻见之知”的热情态度。

陆陇其对古代典籍的研习一方面表现了他对朱子学强调闻见之知的忠实践行,一方面也是借此得以进行自我表达。陆陇其的知识体系非常庞杂,除了实际的经验、技术之外,传统的四部之学靡不涉猎,《三鱼堂日记》中有大量学术随笔、短札,内容包括经学、史学和相关涉的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还有对典章、名物、制度的考证,以及阅读集部诗文的心得。这些短札显示了他丰富的学术趣味,某种程度上也都属于其自我言说的形式。例如十月初八条记云:“阅《左传》邓曼论楚子一段,有感于持盈之道也。向读所谓‘余心荡’者,未知如何谓之荡。杜注谓‘荡,动散也’,动、散二字,与‘主一无适’正相反。临时而思虑散乱,不能专一,是之谓荡。非必荒淫放佚,然后为荡也。然以为盈而荡者,则又何故?夫思虑散乱之人,必隐然有一段自满之意。若以目前之事为不难,而旁思横想,浸淫至于不可收拾,非精神耗散而丧身,则谋为颠倒而僨事。然则邓曼何不于王前一言提醒,使之收拾其心,以干大事,而惟退而窃叹也?曰:邓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详。然亦知虽言之,而非一时所能收拾。甚矣,盈之为害也。”<sup>[2]152</sup>陆陇其在这里将楚武王对邓曼所言“余心荡”三字作了新的解释与发挥,得出了思虑过多,就会导致“盈之为害”的结论。这层意思完全是他自己的体会,可见陆陇其的经学延续了晚明那种但凭己意解经的习气。此外,陆陇其对集部诗文,也颇有心得。例如闰月廿七条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元微之《连昌宫辞》、杜子美《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今之诗人不敢尔也。”<sup>[2]92</sup>对诗歌与时代风尚之间的关系认识得颇为深刻。这些知识系统之间彼此互动,通过作者在日记中的自我表达和言说,展现出他宽广多样的知识边界。

在日记中,还可以见到陆陇其个人读书生活的某些细节。陆陇其好在《三鱼堂日记》中记录自己的阅读经历,摘录他认为值得记录的语段,并写下自己阅读后的感受,与文本形成对话,在此

过程中充分表达自我。比如他对理学语录的兴趣十分浓厚,《三鱼堂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借阅、购买、校对、阅读理学家文集的经历,并在日记中大量抄录文集中的只言片语,在其后加上诸如“此一条说得好”“此亦说得斟酌”之类的评语。在文学文本的阅读中,他也一样喜欢作评点。康熙戊午年(1678),他比较完整地记录下自己阅读《明文选》的经历。正月廿八日记云:“至枫泾。舟中看《山晓阁明文选》。”“廿九。……孙言金陵有诸生黄俞邠者,其家有千顷斋,最富于书,《明文选》大抵皆从其家借得者。余谓《明文选》何以遗吕泾野、罗整庵,孙云以其腐而遗之。查此选,理学之士遗者甚众,如胡敬斋、魏庄渠、冯少墟皆不与。”<sup>[2]84</sup>此后连续五天,一直到二月初七,陆陇其都在舟中阅读这部《明文选》,在《三鱼堂日记》中记录下不少心得体会,发表了诸多意见:

初四。阅金正希文,嫌其多衰飒之气。张天如文颇精实,而气多滞。有陈宏绪号石庄者,文气甚爽,未详其为何人。陈卧子《平内盗议》颇佳。<sup>[2]85</sup>

初六。阅隆庆朝文。田一隼《罗念庵祠田记》、李维禎《告信陵君祠》文,俱可人意。于慎行《与司寇丘公论江陵事》,最是有关系文字。<sup>[2]85</sup>

初七。阅冯琢庵《寄山阴王相公书》、伍容庵《上首辅书》,是有用之文。而陈眉公、袁石公等书,俱纤细,无足取。<sup>[2]86</sup>

这样的言说方式,非常类似于文学批评中的评点形式。陆陇其本身也是八股文创作与批评名家,长期的课馆生活让他形成了这种思维惯性,并带入到《三鱼堂日记》的话语言说方式中。这样的言说方式,有着明显的自我表达倾向,从这种表达方式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朱子学信仰的烙印,也可以看到儒家“道问学”的智识主义传统在他阅读生活中的体现。这些知识与具体的行政经验和技术在不同层面同时构建起他完整的儒学世界。

有学者认为:“清代日记一如清人治学,其涉猎广泛、博洽多识超迈前代。清代日记往往在叙写日常生活、交游、见闻的同时,将故实、识见乃至诗文融入其间,驳杂斑斓、缤纷多姿、异趣横生。如果说晚明日记多为‘文人日记’,以摹写雅情逸趣、人世感悟而见长,清代日记则多为‘学人日记’,以经世致用、质朴博学为特色。”<sup>[13]</sup>也因为《三鱼堂日记》到处充斥着学问与知识的记录与思考,以至于陈左高先生认为《三鱼堂日记》“盖系一部理学家治学生活之日记”<sup>[14]</sup>。但在记录学问的表象之外,我们更应该通过《三鱼堂日记》,看到作者内心世界的其他特征,看到作者知识的兴趣、来源以及边界。关于明清易代之际学术形态的演变,目前学界已形成了“政治高压”“王学反动”“理学自发”“内在理路”等多种阐释路径和范式,而这种演变何以影响到具体的士人心态,尚需要从微观入手考察。日记文体以其特殊的文学书写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类似《三鱼堂日记》这样的文本,正可被看作是文学回应思想史运动潮流的典例之一。

#### 参考文献

- [1] 吴光西,郭麟,周梁.陆陇其年谱[M].褚家伟,张文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1.
- [2] 陆陇其.三鱼堂日记[M].杨春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
-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夏晓虹,陆胤,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26.
- [4] 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六三九)[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5] 陆陇其.陆陇其集[M].王群栗,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393.
- [6]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六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9936.
- [7] 鱼宏亮.知识与救世: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8.
- [8] 陈鼓应.明清实学史[M].济南:齐鲁书社,1989:1360.
- [9] 王汎森.明末清初思想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84.

- [10] 葛荣晋. 中国实学思想史[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58.
- [11] 钱穆.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 8 卷)[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 [12]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1:7.
- [13] 邓建. 从日历到日记:对一种非典型文章的文体学考察[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8-23.
- [14] 陈左高. 中国日记史略[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94.

## Research on Lu Longqi's Confucian Thought

TIAN M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Diary of San Yu Tang* was written by Lu Longqi, a Neo-Confucianist in Qing Dynast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excerpts from insightful remarks, which reflects the identity of the author as a Neo-Confucianist, his pursuit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fact that Confucianism had permeated the daily lif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is belief in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and strong interest in knowledge are embodied in the introspection and self-expression in the diary, which make the enlightening discours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of Zhu Xi, the pragmatic thoughts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concept of administering affairs, the author combined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world completely governed by Confucianism. From this, we can discover the scholars' changes of academic interest, source and boundary of knowledg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 words:** Lu Longqi; *Diary of San Yu Tang*; discourse style; Neo-Confucianism

〔责任编辑:顾国华〕